

茅蔚然 著

中國近現代各派教育
思想與教學方法簡史



中国近现代各派教育思想 与教学方法简史

茅蔚然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七·成都

责任编辑：韦其珉

封面设计：牟 桓

版面设计：王 凌

**中国近现代各派
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简史**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4 插页 4 字数 296 千

1987年9月第一版

198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40册

ISBN7—5408—0139—S/G·138

书号：7344·886

定价：3.08元

前 言

1983年9月,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给我们指出了社会主义教育改革的战略方向,对各级学校培养又红又专的创造型人才提出了最新的要求。“三个面向”的贯彻和实施,必将使我国的教育事业为振兴中华作出更新、更大的贡献。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将使中华民族以最快的速度在世界上崛起和腾飞。

在建国三十五周年的庆祝典礼上,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再一次强调:要大大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大大加强各级教育工作,以及全体职工和干部的教育工作,这对我们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又是一次殷切的期望和号召。确实,从我们国家的教育现状来看,无论从教育体制、教育结构、办学指导思想、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各个方面都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改革,才能符合四化建设的需要。事实上,教育面临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并不只是局限于我们一个国家,而是遍及全世界的所有各国。如何面对新的挑战?专家们所设想的对

AA ✓ 75/10 0/1

策当然很多，但是归根到底，就在于人才的培养，就在于实施新的教育。因此，国内外的有识之士都有共同的认识和见解，即：未来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实质上就是教育的竞争。谁重视教育，谁就拥有未来；谁重视了教育改革，谁就能抓住时机使国家民族兴旺发达。因此，在教育要“三个面向”的指导下，改革教育，培养人才，振兴中华，就是历史赋予我们教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南宋诗人陆游写过“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诗句，清代学者顾炎武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那么，我们新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更应当自觉地从实际出发，采取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在讲求实效中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更好地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在今天，放眼世界和了解国外的信息显得十分重要。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乔治对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作了深入的研究，因而推崇备至，他特地撰文十分赞赏地向人们推荐，他说：“你想成为第一流的管理人才吗？那就必须去读读中国的《孙子兵法》。”日本的管理学界中目前出现了“孙子兵法学派”。可见，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遗产宝库中确有许许多多值得人们学习的精华。就以教育史方面来说，正如《中国教育报》在一篇题为《改革教育 迎接教育事业光辉灿烂的未来》的社论中写道：“我们有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也有旧中国的教育经验，特别是有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教育经验。对这些经验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因此，我们对中国近现代的教育史加以深入地研究，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史时期各派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的研究，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需要，以便从中吸取精华，作

为借鉴。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周谷城教授语重心长地指出：“从‘五四’运动至今，我们教育工作者培养了那么多人才，不仅培养了大批革命战士和各种建设人才，也培养了不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专家、学者。这里就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问题是，从整体来看，我国教育工作者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比较分散，散见于他们各自的实践、经历之中，缺乏综合和系统深入的研究，没有形成有我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教育史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史，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这一点至今尚未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我们对现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非常不够……”（见1984年11月8日《人民日报》）周老的卓越高见，正说出了史学界前辈们早想说的肺腑之言。记得1983年在成都举行的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第三次学术会议期间，几位老前辈和一些同行们曾经鼓励我写一本《中国近现代各派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简史》的集子，以供师范院校和教育学院、教师进修院校各系、科、专业作为教学法课程的公共自学读物，同时给在职的广大中小学和中等师范学校、职业学校与幼儿园的教师，以及各级教科所、教研室的研究人员作为借鉴和研究的参考资料。于是，我就鼓起勇气将自己多年来所积累的资料加以整理、研究并动笔写稿。时隔一年之后，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于1984年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学术会议时，四川吴景贤教授、上海沈起炜教授等几位老前辈和同行们再次对我加以鼓励和催促，同时，上海教育学院张家祥院长在大会发言中也一再强调：“教育学院应把教学法的地位提得很高，……把教学

法放到很重要的位置上，我们教育学院应该在这方面有所贡献。”于是，我就把已经写成的中国近现代史时期的十位著名教育家——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鲁迅、陶行知、毛泽东、徐特立、吴玉章、竺可桢、程今吾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先汇成一本集子，对每位教育家的成就与贡献和国际上同时代的教育家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比较探讨，以向行家们求教。当然，在中国近现代史时期，著名的教育家何止以上十位，实际上，在我国近现代教育界的明星巨匠和大师，至少在几十位以上，甚至可达百人之多，他们都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各有真知灼见。但是，限于时间、精力和水平，只能先以一本小集子作为抛砖引玉，以求前辈和同行们有更具丰富内容和更高研究水平的专著早日问世。

《中国教育报》于1984年9月1日《在改革中迎接新学年》的社论中特别强调：“中央领导同志最近指出，要重视教学方法的改革，要提高学生的能力。这一指示切中时弊。”因此，我们除了要注意吸收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之外，更有必要批判性地继承和发扬我国著名教育家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方法。吉林大学张松如副校长说得好：“起点在历史与现实之纵横交叉处，现实决定目标，历史指示方向。”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沿着前人走过的道路上继续探索 and 开拓的创造中前进，前人开拓了万古洪荒，后人创造了新的世界；前人走过的足迹之处，变成了后人步伐的起点而勇往直前。整部教育史，也同样是按照这个发展过程在前进着。因此，总结和研究前人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对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确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今年（一九八六年），应四川教育出版社要求，对本书作了必要的修改和扩写，补充撰写了我国著名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张澜、马叙伦，中等教育学校行政管理专家吴炜、企业教育的著名实践家卢作孚，民主主义的爱国教育家张伯苓，爱国华侨领袖、教育事业家陈嘉庚，卓越的职业教育家黄炎培，杰出的儿童教育家陈鹤琴，著名的女教育家吴贻芳。使这本集子共计写了中国近现代史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十九位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的内容，全书已达三十万字左右，比1985年在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第五次学术会议期间交流的集子增加了一倍多。应当着重说明，本书在第一次写作十位教育家时，得到杭州大学历史系王正平教授的指教，杭州大学历史系徐规教授在百忙之中作了审阅。同时，我在1983年出版的《中小学历史教学法》一书，在1984年出版的《小学历史教案》上、下册，也都得到他们两位专家和杭州大学历史系胡玉堂教授、管佩韦教授的帮助和指教，借此机会，一并致以深谢！

茅蔚然

一九八六年夏于杭州教育学院

目 录

第一编 中国近代史时期各派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研究

- 一、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2 ）
- 二、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25 ）
- 三、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39 ）
- 四、鲁 迅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61 ）
- 五、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71 ）

第二编 中国现代史时期各派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研究

- 一、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105 ）
- 二、张 澜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132 ）
- 三、陈嘉庚的办学思想（教育思想）与实践……………（ 170 ）
- 四、张伯苓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197 ）
- 五、徐特立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223 ）
- 六、吴玉章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241 ）
- 七、黄炎培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257 ）
- 八、马叙伦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283 ）
- 九、竺可桢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297 ）
- 十、吴 炜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308 ）

十一、陈鹤琴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333)
十二、卢作孚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371)
十三、吴贻芳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393)
十四、程今吾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417)

第一编 中国近代史时期各派
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研究

一、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后易号更生、更甦，晚号天游化人。清朝进士。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书》、《康南海先生诗集》等。

在我们研究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的过程中，更加使人想起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反复说过的一句名言：“熟知并非真知”。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对这句名言有过高度的评价。黑格尔曾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明确指出：

“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是的，人们都熟悉康有为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重要首领和主要代表，后来却成为复辟帝制的保皇派人物，晚节不佳，似成定论。但是，对康有为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恐怕还没有被世人所真知。

康有为出生在广东南海，一个历史人物所生活的地理环境，对其思想的变化与发展往往具有一定的以至重大的影响。康有为出生的时间，又处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爱璘条

约》和《天津条约》的1858年，逝世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1927年。他似乎生不逢辰，但从促成他思想发展的这一角度上来说，又可说是生得其时。这个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曾经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的艰难岁月，经过千辛万苦的曲折奋斗，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找真理，他不愧为“先进的中国人”之一；尤其是他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曾经在中国近代史时期产生过重大的作用，并留下深远的影响。我们应当公正地说，康有为是一位中国近代史时期具有卓越远见和崇高教育理想并努力从事改良主义教育实践的著名教育家。

众所周知，今天的北京大学，它的前身就是京师大学堂，这是戊戌变法运动的直接产物。可以设想，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能出现一所近代化的高等学府，实在是一件空前的壮举。尽管流光易逝，却始终不能磨灭康有为教育思想的光辉纪录。因为，京师大学堂的诞生，就是康有为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坚持废科举、兴学校的重大成果。

任何一个教育家所创立的各种教学方法，既是他本人教育思想的直接反映，又是教学实践的具体产物。

（一）康有为的教育思想

教育是国家的富强之本。重视德育教育，提倡体育教育，强调智育教育必须结合德育教育。

康有为在一系列论教育的著作中，着重提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中心思想：教育是国家的富强之本。他曾经反复地强调，教育是决定人的善恶智愚的重大因素。因此，他坚定地主张用教育的力量来培养人才，以人才去改良国家的政治，唯有政治

改良才能改变中国的贫穷和落后状态，从而使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走上富强之路。这是康有为教育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无疑，康有为在十九世纪晚期所形成的教育思想，具有顺应历史潮流的先进性。

《大同书》是康有为的一部重要代表作。在《大同书》里，康有为突出了教育的地位，强调了教育的作用，他明确指出：“大同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事实上，康有为所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观其全局，就是运用了教育的力量，无论组织学会，创办报刊，或是设立学校，都是依靠教育来培养维新变法的力量，从而去争取变法维新的实现。

应当提及，康有为十分重视教育并突出教育的重大作用，在他《上清帝第二书》中也作了充分的表达，他曾经写道：“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穷理劝学的教育就可以培养出大批“才智之士”，因而康有为断言：“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由此，他非常痛心感叹：“中国之如此衰弱，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良好的教育。”所以他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的时候就大声呼吁：“今日中国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讲学也。”康有为坚决主张：“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

有人说，康有为的教育思想终究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是的，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不过，首先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的是：革命和改良之间究竟有什么辩证关系？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就是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了这个真理。列宁在《反对帝制》的论文中指出：君主立宪的道路，“一点也不排斥革命，这条道路也在间接酝酿着发展革命

的因素。”（《列宁全集》第一卷，第715页）同时，列宁在另一篇论文中写道：“革命是一条直接的对人民有利的道路。改良运动通常是缓慢的道路、审慎地、逐渐地前进，而不是倒退。”

（《列宁全集》第四卷第576页）那么，康有为的教育思想，虽然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但他确有令人称道和赞许之处，甚至，还能引起后人的崇敬。例如：他坚决主张废除科举制度，这种改良主义的主张，已经酝酿着革命的因素。大家知道，我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自从七世纪初开始，经历隋、唐、宋、元、明、清一千二百多年，到了维新变法的1898年，康有为写了一份《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在这份奏章里，他对科举制的种种弊病，不仅一一列数，又加严厉批判。康有为认为：科举制的最大害处就是“令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其结果，就使“人才”变成“学究”，这些“学究”既不懂得世界大势，又不明白国外的文物，而且对自己祖国的历史人物也不甚了了，甚至一无所知。因此，由科举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在这里，人们不难看出，康有为教育思想的先进性之一，就在于首先胆敢全盘、彻底地否定以至痛斥和批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这在清朝的顽固派看来，康有为的言行真是大逆不道，但康有为却作了理直气壮的反驳：“此乃救国良计。”当然，康有为的教育思想还反映了破和立的两个方面：废科举是破，兴学校是立。在1898年7月，康有为写了一份《请开学校折》，在这篇奏章的字里行间，康有为把自己的教育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他一再提出，中国的教育制度，应当仿效德国和日本，同时又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以

德日为师”“并合乎国情”。康有为充满着乐观主义的激情，尽情地描绘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他希望在中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教育系统：

各乡设立乡立小学，凡是年满七岁的儿童均应进入乡立小学读书。乡立小学的学制规定为八年，这八年里必须开设的主要课程是：国文、历史、舆地、物理、体育、歌乐。乡立小学的教育阶段是每一个儿童必须接受的义务教育。康有为主张在义务教育阶段，应当带有强制的性质，儿童“不入学者，罪其父母。”

各县设立县立中学，凡是年满十四岁的少年可入县立中学求学。县立中学应分设初等科和高等科。初等科和高等科的学制各二年。初等科和高等科应当开设的主要课程是：国文、历史、舆地、物理、体育、歌乐。这些课程名称虽和小学相同，但其教学内容和程度均应增多和加深。同时，还必须注意，初等科和高等科的教学内容，除了系统连贯性，还应分出阶段性。除了以上的这些课程，在中学初等科和高等科都应增加外国语和实用学科的课程。

各县还应设立中等专门学校，如农业、商业、林业、矿业、机器、工程、驾驶等等专门学校。至于还不具备条件单独设立专门学校的一些县，可以把这些专门学科附设在县立中学里，以便让中学初等科二年制毕业的学生升入专门学科学习，学制是二至三年，以培养一批各县所需要的各种中级技术人才。凡是中学初等科二年制毕业的学生，有志深造者，可以升入高等科学习。总之，各县设立的中学，既要培养一部分学生可升学深造，也要培养一部分学生能去学习专门技术。

各省设立省立专门高等学校和大学。按照各省具体条件的不同，有的省既可设立各种专门高等学校，又可开设大学。有的省如受到条件的限制，可先设立因地制宜的几种高等专科学校，学制为二年。特殊学科的专门高等学校，学制为三年。大学的学制是四年。大学可分为四种，即：经学，哲学，律学，医学。在京师则设立一所规模宏大、设备完备、师资优良的京师大学，作为全国的榜样。

康有为的设想，确实十分周到。

后来，1898年的维新变法，虽然只经历了一百另三天而告失败，但康有为的教育理想和教育是国家的富强之本的主张，却在百日维新时期得到了部分的实现，而且他对学校教育系统的建制、各级学制和开设课程的主张，对近代中国一直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在学校教育中，康有为认为最重要的是德育，因此，他在万木草堂讲学的几年里，不教学生在当时十分通行的四书五经，也不教学生陈腐八股，而是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重点讲授今文经学，从而批判古文经学。他在教学过程中常常从《公羊传》和《春秋繁露》里找出根据，发挥他的理论，以此来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因而，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在《康有为传》中有过这样的一段记述：“……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持重焉。”的确，康有为对体育教育的重视，仅次于德育，却高于智育。康有为明确提出，在小学里应有各种体育活动和各项游戏的设备，不仅要有体操场，还应有游乐场。在各项体育活动和游戏的设备中，至少要有秋千、跳木、